

儒学典籍英译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夏云教授

主持人语: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的宝贵财富,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何提高文化交流水平,推动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学典籍走出去,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儒学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儒家经典的翻译,也是海外儒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儒学经典英译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进入新时期,研究对象、视角和方法也日趋多元化。本期专栏组稿两篇,探讨儒学典籍的英译问题。夏云的论文《我国儒学经典英译研究(2001—2021)》对近 20 年国内儒学经典英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基于研究的热点和不足提出了展望。伊咏、宫宝悦的论文以克莱默斯的《孔子家语》英译文为例,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对《孔子家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深入探讨。希望这两篇文章能够引发学界更多关注和思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有益的镜鉴。

主持人简介:夏云,博士,教授,山东省“儒学对外传播研究”青年创新团队负责人,研究方向为语料库翻译学、典籍英译。

责任编辑:吴林娟

我国儒学经典英译研究(2001—2021)

夏 云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山东 日照,276800)

摘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国内学界对我国儒学经典英译研究愈加关注。为分析儒学经典英译研究的现状、不足和发展趋势,以 2001—2021 年国内关于中国儒学经典英译的重要期刊论文为分析对象,从发文情况和研究热点等维度展开研究。基于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方法有待多元化,应将数字人文方法与儒学经典翻译研究相结合,构建客观、可量化、可操作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检验儒学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和效果。

关键词:儒学经典;英译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H315.9

儒学经典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瑰宝,以其深邃的思想引起世界的关注。自 17 世纪以来,《四书》《五经》等最具代表性的儒学著作通过转译、编译或直接翻译等方式,被陆续引介到英语世界,开启了海外民众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知历程。随着儒家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其传播方式也经历了从早期的接受方引入过渡到推介方输出的发展过程^[1]。自 20 世纪以来,本土翻译家大力推进典籍外译,儒学在全球的发展也逐渐得到关注。到 20 世纪末,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等学者就宣称,儒学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将为亚太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基础^[2],而以《论语》为代表的一批儒家经典新译本的问世,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特征。

随着儒学翻译与对外传播的发展,学界相关研究也不断加强。尤其是进入新时代,由国内学者主导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翻译研究整体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3],取得了长足进展。鉴于此,有必要对国内儒学经典英译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相关研究的热点和不足,以期对典籍英译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儒家经典的英译传播,不涉及其他语种的翻译。本研究以 CNKI 收录的 CSSCI 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

收稿日期:2022-02-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学英译的海外认知与接受研究”(20BY019)

作者简介:夏云,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语料库翻译学。

E-mail: 364078092@qq.com

引文格式:夏云.我国儒学经典英译研究(2001—2021)[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1):1-6.

以“儒学(儒家)+翻译/译本”“《四书》《五经》及其他儒学典籍名称+翻译/译本”为关键词检索研究性论文,时间跨度设定为2001—2021,经人工筛选,剔除与研究内容无关的论文、书评、会议综述等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后,最终获得260条文献。数据获取时间为2022年2月20日。研究在传统的文献计量方法基础上,结合质性分析,对近二十年来国内儒家经典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进行分析。

二、研究概况分析

(一) 历年发文情况与文献来源分布

为了梳理我国儒家经典英译与对外传播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我们对检索到的260篇文献进行了发文量统计(见图1),结果显示,2001年至2021年,国内相关研究年均发文量为12.4篇,总体上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但也存在一定波动。2001年—2004年相关研究处于潜伏期,年发文量仅1篇,主要关注《论语》译本介绍或比较分析。2005年起发文量逐渐增多,到2016年达到顶峰,年发文量达到25篇,真正进入了儒学典籍外译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期。2008年—2021年,发文量虽偶有波动,但每年的发文量不下10篇,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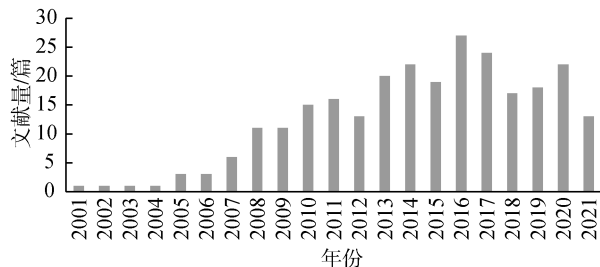


图1 2001年—2021年国内相关研究发文情况

从文献来源来看,儒家经典英译与对外传播的260篇研究论文来自77种期刊,发文量在10篇及以上的期刊共9种,主要集中于《周易研究》《孔子研究》《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学刊》《中国文化研究》等,共刊载论文120篇,占总量的46.2%。在77种期刊中,综合性大学学报种类最多(31本),外语类期刊虽然仅16种,但发文数量为117篇,占发文总量的45%,主要发表在《中国翻译》和《上海翻译》两本翻译类核心期刊上,其中《中国翻

译》发文18篇(6.9%),《上海翻译》发文16篇(6.2%)。《周易研究》《孔子研究》《国际汉学》等期刊,在儒学外译传播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呈现出翻译研究与哲学、史学等领域交叉融合的研究特色。

表1 2001年—2021年期刊发文情况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	占比/%
1	周易研究	15	5.8
2	孔子研究	14	5.4
3	中国翻译	18	6.9
4	上海翻译	16	6.2
5	外语学刊	14	5.4
6	中国文化研究	13	5.0
7	中国外语	10	3.8
8	外国语	10	3.8
9	国际汉学	10	3.8

(二) 高产作者与机构分析

从作者发文情况来看,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学者共24人,其中,青岛科技大学李玉良发文排名第一,共发文10篇。李玉良长期从事儒学的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其研究不仅涉及《诗经》《论语》等典籍的译本批评,也深入探讨了译者翻译行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阐释与改写。排名次之的有吴钧、杨平、李钢等学者,发文量均超过5篇,主要关注重点是《易经》和《论语》等典籍的英译策略与对外传播。

笔者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发现,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高校有15所,总发文量为113篇,占43%。其中,山东大学排名第一,在其所发的14篇论文中,7篇论文深入探讨了《易经》的英译与传播问题,体现了山东大学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易学研究特色,展现出该校在文史哲研究领域,尤其是儒学研究与传承方面的深厚底蕴。山东大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闻一多、高亨、童书业、庞朴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先后在儒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近年来,该校出版的系列《国际儒学发展报告》,已成为国际儒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周易研究》作为国内唯一的易学研究专刊,既注重传统易学问题的研究,又倡导易学与其他学科的多层次、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为儒学对外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

深圳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三所高校

发文量紧随其后,均在10篇以上。表2展示了名列前15位的研究机构及其发文数量,可以看出,前15所高校皆为非外语类院校,这些高校中,比较活跃的研究者不仅来自外语学科,也有部分来自历史、哲学、比较文学等领域,其研究带有一定的哲学与史学特征。例如,山东大学管恩森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了理雅各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4]。姜燕则对理雅各《诗经》翻译过程中体现的宗教思想、政治倾向和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阐释^[5],认为其宗教观念经历了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狭隘偏见,到宽容、自由的比较宗教观的演变,学术思想也从较多地依赖传统和服务政治,而逐渐走向强调独立意识的学术阐释。

表2 发文机构统计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1	山东大学	14
2	深圳大学	11
3	青岛科技大学	10
4	湖南大学	10
5	湖南师范大学	8
6	复旦大学	8
7	南开大学	8
8	华东师范大学	7
9	中山大学	7
10	中南大学	6
11	长沙理工大学	5
12	武汉大学	5
13	四川大学	5
14	中国人民大学	5
15	上海海事大学	5

三、研究热点分析

(一) 译本批评

儒家经典译本的批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部分研究关注翻译策略与译本得失,主要方法是基于误译指正的译本准确性与质量评价,带有规定主义研究的特点。例如,何刚强对阿瑟·威利《论语》译本的得失进行了评析,以确立可取的英译策略。研究认为,该译本在语义合理性上不尽如人意,对先秦古文字在理解与解释上出现偏差,但句法的合理性使得该译本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认可^[6]。李霜讨论了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得与失,

认为其最大的缺点是过度意译,使得译文缺失了中国传统文化色彩^[7]。

更多研究采用描写主义研究方法,对文本翻译风格、译者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研究路径和理论视角日渐多元。语言学视角的研究层出不穷,涵盖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修辞学等。如鞠玉梅基于评价理论,比较分析了《论语》威利译本和刘殿爵译本中的判断资源及其修辞功能^[8],黄国文则探讨了《论语》英译本的语域变异、语篇结构变异、语言变异^[9],刘正光从辖域、视角和突显的维度考察了《论语》英译中各种偏离现象的深层认知动因^[10]。

也有研究者基于哲学诠释学、顺应论、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等理论视角考察儒学经典的英译现象及成因,研究的焦点也从翻译的内部因素逐渐转向了对外部的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描写与阐释。例如,徐珺以理雅各和威利的译文为主要语料^[11],分析了在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下,《论语》译者自主性的翻译改写与顺应;向平考察了裴松梅《易经》英译本中的副文本、补充、劫持三种女性主义翻译方法^[12];宋晓春基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成果,指出安乐哲《中庸》译本广泛使用了焦点和场域语言,诉诸注释的类比并摒弃因果性语言,从而彰显了中国哲学的异质性和独有的言说方式^[13]。杨平基于哲学诠释学视角讨论了《论语》翻译的诠释性,认为诠释学的指导意义体现为文本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的有效性以及诠释的多元性与孔子形象的多面性^[14]。

(二) 儒学概念英译

儒学经典英译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儒学核心概念的翻译。儒学核心文化概念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显著的地位,在英译过程中往往得到多样化的诠释,也是典籍英译的难点之一。相关研究中,“仁、天、君子”等概念的英译研究备受青睐。总体来讲,如何翻译这些文化概念,使其既能体现丰富的源语文化内涵,又要符合受众的期待,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杨平探讨了《论语》中的“仁”在多个译本中的英译及其理据,认为大多译法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建议为了忠实传达孔子思想丰富而又深刻的哲学内涵,最好采用音译^[15]。胡翠娥考察了英语世界对《论语》“仁”的翻译,分析了不同译文体现的对儒学创新性的认识和定位^[16]。边立红收集

了儒家典籍作品英译本中有关“君子”的翻译,并就“君子”内涵的历史演变和各种英译形式的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译者对“君子”概念的重构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视点、审美观念和历史性,同时指出,用阐释或类比的方法虽有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不利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以及各民族文化间的交融和互补^[17]。韩星、韩秋宇比较分析了理雅各和威利的《论语》译本,在还原儒家语境中的君子文化的基础上,认为理雅各的 the superior man 对于概念的把握比较准确,兼顾了“君子”德性和身份地位的双重内涵^[18]。还有不少学者分别对“天”^[19-20]、“礼”^[21]、“理”^[22]、“诚”^[23]等概念的翻译、误读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

(三) 译介过程与影响

部分学者从译史或传播史角度关注儒学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关注的译介与传播主体多为理雅各、翟里斯等早期传教士,史景迁、安乐哲等当代汉学家,或者辜鸿铭、林语堂等少数华人译者。此类研究主要依据史料的挖掘,往往依托翻译家研究对史实进行梳理和分析。例如,杨平考察了早期传教士和汉学家在儒家经典翻译中体现的宗教取向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以及在早期欧美政治、思想和文化界引起的巨大反响^[24]。王琰在分析西方儒家思想研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讨论了美国汉学发展与《论语》两种诠释定向,认为其多元化形态不仅促进了西方儒学研究多元化的形成,对于促使西方汉学与其他学科以及中国学界的对话和交流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5]。范祥涛描述了19世纪前四部儒家典籍的英语转译情况,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儒学建构产生的积极影响^[26]。李伟荣分析了资深汉学家闵福德的主要汉学成就与翻译《易经》的缘起、他采用的传统注疏编译方式及其易学思想内涵,并论述了闵福德的翻译实践对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27]。

(四) 儒学经典的海外接受

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稳步推进的环境下,儒学海外传播研究路径更为多元,开始关注儒学经典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情况,并尝试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作为检验译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张晓雪统计分析了《论语》英译本在Google Scholar数据库中的被引情况、亚马逊网站销

售情况以及读者评论,讨论了译者、环境、译本、受者等要素对译作接受效果的影响^[28-29]。有研究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对《论语》英语多译本的受纳状况进行多维数据分析,发现大部分翻译文本带有强烈的“他者”文本特征,难以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儒学核心概念在翻译文本中缺少一致和稳定的表述,令其难以在目标文化中形成独立的识别度高的儒学概念^[30]。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近二十年来,儒学经典英译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方面,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从语言学视角的语言转换机制研究,到多视角的翻译批评与阐释,从推介方视角的传播研究,到近年来基于接受方视角的译本传播与接受效果研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界开始注重了解接收端文化、偏好和价值取向,以此探索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接受状况。另一方面,翻译方法不断成熟。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或文本数据挖掘手段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如李广伟、戈玲玲^[31]基于平行语料库对辜鸿铭《论语》译本中的本源概念英译进行了研究,范敏^[32]借助《论语》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比较和探讨了《论语》五译本文化高频词的翻译。但整体而言,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1) 个案研究较多,传统的研究大多依赖基于译本的个案分析,重视通过翻译文本批评探究翻译的一般规律,对宏观特征的系统研究较少,量化分析鲜见,基于大规模数据的研究仍处于探索性数据挖掘阶段。

(2) 研究焦点为早期儒学典籍英译,尤其是《论语》的翻译。从研究对象的分布来看,2001年—2021年以《论语》为专题进行的相关研究有120篇,占发文总量的46%,成为儒学英译与对外传播研究的重中之重,《诗经》(35篇)、《易经》(29篇)研究次之,对《大学》《礼记》以及朱子学等其他经典英译与传播的研究较少,总体分布不够均衡。

(3) 研究内容上,学界重视儒学翻译文本及其传播研究,但儒学海外传播效果研究相对不足,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估和监测方法,译本及其传递的儒家文化在海外接受效应难以得到系统描述和分析。

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未来儒学经典英译研究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重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扩大现有研究语料,借助文本数据分析方法高效检索、分类和呈现文化传播数据,探索儒学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总体状况和影响因素。

(2)加大儒学英译与传播研究力度。在关注早期经典英译的基础上,向当代译本研究均衡发力;四书、五经以及其他经史子集类典籍的翻译与研究应同步进行,全面开花;在研究内容上,儒学英译的内部研究持续加强,而面向文化的传播、出版等因素的外部研究,或许将成为重要研究热点。

(3)关注译本的传播效应是典籍翻译探索的新方向,但传播效应的构成与评估方式尚不明确^[30]。未来研究应立足目标文化,整合话语分析、翻译学、哲学和传播学等视角,加强对翻译话语与海外原创儒学传播话语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借此考察目标读者对儒学经典的认知与接受状况,了解接受方的信息需求、偏好以及认知情况;在此基础上,构建客观、可量化、可操作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检验儒学文化“走出去”的效果。

五、结语

儒学文献的国际传播,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全球战略实施的质量与效果。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翻译研究的内容、方法和研究成果也在不断丰富和成熟。本文对近二十年儒学经典英译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当前研究既有理论建构,也有实践关注,由关注语言转换过渡到关注文化接受环境,由个案分析发展到大规模数据挖掘。但相对而言,基于推介方视角的研究数量远超接受方视角的研究。中国的外向翻译若要达到理性效果,就需要考虑目标文化的意愿和规范,文化传播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33],了解目标国的社会因素、意识形态、道德观念,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真正走出去^[34]。因此,聚焦当代儒家思想海外传播的方式和效应,观察和分析海外受众的期待与需求,有助于系统评估儒学译本和儒学思想在异域文化中的接受效果,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秦洪武,孔蕾. 儒学海外传播的探索性数据分析[J]. 当代外语研究,2016(6):23-29,109.
- [2] 王丽雅. 儒家经典英译与儒家思想的跨文化传播[J]. 管子学刊,2008(2):113-115.
- [3] 王宏,沈洁,王翠,等. 典籍英译新发展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xi.
- [4] 管恩森. 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J]. 周易研究,2012(3):58-65.
- [5] 姜燕. 理雅各《诗经》翻译初探——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经典[J]. 东岳论丛,2011(9):85-89.
- [6] 何刚强. 瑕瑜分明,得失可鉴——从 Arthur Waley 的译本悟《论语》的英译之道[J]. 上海翻译,2005(4):15-19.
- [7] 李霜. 辜鸿铭英译《论语》得失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3):103-106.
- [8] 鞠玉梅. 《论语》英译文语篇评价系统之判断资源的修辞功能[J]. 当代修辞学,2016(5):37-48.
- [9] 黄国文,陈莹. 从变异看《论语》的英语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3):61-65.
- [10] 刘正光,陈弋,徐皓琪. 亚瑟·韦利《论语》英译“偏离”的认知解释[J]. 外国语,2016(2):89-96.
- [11] 徐珺,肖海燕. 《论语》英译的改写与顺应研究[J]. 外语学刊,2018(4):95-101.
- [12] 向平. 基于语料库的裴松梅《易经》英译本的女性主义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2018(4):91-96.
- [13] 宋晓春. 比较哲学视阈下安乐哲《中庸》翻译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2):77-80.
- [14] 杨平.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论语》翻译[J]. 中国外语,2012(3):101-109.
- [15] 杨平. 《论语》核心概念“仁”的英译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2):61-63.
- [16] 胡翠娥. “殊德之仁”与“全德之仁”——海外译“仁”及其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之发展[J]. 外国语,2020,43(1):94-101.
- [17] 边立红. “君子”英译现象的文化透视[J]. 外语学刊,2006(4):94-99,112.
- [18] 韩星,韩秋宇. 儒家“君子”概念英译浅析——以理雅各、韦利英译《论语》为例[J]. 外语学刊,2016(1):94-97.
- [19] 张政,胡文瀟. 《论语》中“天”的英译探析——兼论其对中国文化核心关键词英译的启示[J]. 中国翻译,2015(6):92-96.
- [20] 李广伟,岳峰. 阐释学视阈下《诗经》中“天”之源流及其翻译影响因素考察[J]. 中国外语,2020(5):100-107.
- [21] 李玉良,张彩霞. “礼”的英译问题研究[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126-129.
- [22] 赖文斌,温湘频. “理”屈且词穷:麦格基与第一部朱子文献英译本[J]. 中国翻译,2020(3):49-58,188.
- [23] 江晓梅. 《中庸》“诚”概念及其英译比较分析[J]. 中华文化论坛,2015(2):35-42,191.

- [24] 杨平. 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评析[J]. 中国文化研究, 2010(4): 206-212.
- [25] 王琰. 《论语》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当代发展[J]. 中国翻译, 2010(3): 24-32, 95-96.
- [26] 范祥涛. 早期儒家典籍英语转译中的文化传播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5): 770-778, 801.
- [27] 李伟荣. 汉学家闵福德与《易经》研究[J]. 中国文化研究, 2016(2): 150-162.
- [28] 张晓雪. 《论语》英译本海外传播现状与对策探讨——基于亚马逊网上书店以及 Google Scholar 数据统计分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 157-160.
- [29] 张晓雪. 翻译说服论视角下《论语》英译本接受效果分析——以 Google Scholar 被引统计为依据[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3): 70-76, 95.
- [30] 秦洪武, 孔蕾, 徐欣. 《论语》英语多译本受纳状况多维数据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4): 580-593, 641.
- [31] 李广伟, 戈玲玲. 基于汉英平行语料库的《论语》中本源概念英译策略研究[J]. 外语教学, 2018(1): 87-91.
- [32] 范敏.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五译本文化高频词翻译研究[J]. 外语教学, 2017(6): 80-83.
- [33] 陈致远. 中国声要有中国味儿——论中国对外交流和传媒的话语权问题[J]. 对外传播, 2014(11): 45-47.
- [34] 王志勤, 谢天振.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问题与反思[J]. 学术月刊, 2013(2): 21-27.

Studi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2001—2021)

XIA Yun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is attracting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at home.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domestic research from 2001—2021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hotspo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tatus quo of current studi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esents som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By assessing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studies, the paper holds that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combining digital humanistic methods and traditional studies to construct an objective, quantifiable and feasible mechanism to assess the method and effect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Key words: Confucian Classics; English transla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